

#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 金融资源配置权博弈

何凤隽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中央政府集中配置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的过程。在现有的中央政府配置金融资源的成本与收益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博弈结果意味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下,通过扶植(或至少不压制)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实现。

**关键词:**金融资源;资源配置权;博弈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4-0042-02

## The Game of the Co-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by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Local Governments

HE Feng-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llocation to the co-alloc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llocating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co-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by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local governments has become the Nash equilibrium of the game. This result of the game mean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allocating financial resources could be realiz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t changing the property structure of state financial system, by supporting (at least not suppressing) the non-st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rights; the game

### 一、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权变化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由集权(中央政府集中分配)到分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配置)的过程。中央政府集中配置金融资源起因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权让利的改革,这一改革使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而转轨期间的政治约束(即政府要控制改革节奏、保护既有的国有企业生产力、避免产出下滑和保持社会稳定),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于是中央政府推动了以纵向分割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将国有金融体系拆分为各类专业银行,并将网点铺设到每个地区,去收集民间金融剩余。中央政府的上述控制使得大量金融资源集中到国有银行,一个

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资源配置体制即告形成。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中国的银行资产(仅包括中央政府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值)占GDP的比重为128%,远远大于股票和债券所占20%的比重,而同期以上两项的比重韩国分别为69%和84%,马来西亚93%、396%,菲律宾51%、117%,泰国95%、112%,都是股票债券占比超出银行资产占比。就日、德、英、美四国平均值看,也是如此,即分别为143.25%和149%(张杰,1997)。大量金融资源集中到国有银行,为中央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对其加以使用提供了便利。

可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的利益追求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利益范围之外开始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同时,在分权改革的影响下,以及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状态下,地方政府为获取和支配最大可能的信贷资金,也介入了金融

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的介入给金融体制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过程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三个方面的变化最值得关注:第一,地方政府都竞相利用它们新获得的政治影响向金融机构施加压力,中央银行驻地方的代表们很难抵御地方的需求,最终形成“地方分支银行对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第二,各地区与部门大都通过竞相创设大量旨在为其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而程度不同地获取了支配金融资源的权力。第三,由于地方压力的普遍存在,各类金融机构资金的跨地区流动受到遏制。虽然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不同规模与类型的金融市场,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地方政府塑造的痕迹。且只具有省级或地区规模,彼此间的联系极少,由此导致金融资源的地方分割状态(张杰,1996)。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制,以及地方官员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所以,在地方政府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后,地方经济呈现了这样一个状况:地方政府过分追求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项目选择偏爱那些花钱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这虽然推动了各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种局部行为却导致了总体金融资源的不良配置和效率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限制与中央政府偏好不一致的利益追求,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推行了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高准备金制度。1984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分设时,规定各专业银行要将一般储蓄存款的40%、农村存款的25%、企业存款的20%和财政性存款的100%作为存款准备金上缴中国人民银行,从而使中央政府控制了大约全国信贷资金的40%—50%。后来经过数次调整,在1998年前,存款准备金率一直保持在13%的高水平。同时,还要求各专业银行缴存5%—11%的备付金。这样,法定准备金总比率高达18%—24%(张杰,1997)。高存款准备金制度限制了国有银行自主运用资金的权力,强化了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

但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金融是有成本的,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主要有四个:(1)支付的信息和监控成本;(2)国有金融组织相对增多的经营费用(导源于没有建立有效治理结构的国有金融产权的外部性和官僚主义行为)。这两项是直接的成本。事实上,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不止这两项,潜在的损失还包括:(3)低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损失;(4)增多的不良资产损失(政策性呆帐和非正常的商业性呆帐)(林斌,2000)。而且,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的配置的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控制成本在上升。从理论上讲,当控制成本上升到一定水平,中央政府就会选择退出策略。如果中央政府放松金融控制,把金融资源的配置权逐渐让与民间,地方政府

参与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也就大大减少,这样整体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提高。

可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却难以退出呢?为什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会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均衡解呢?下面我们将用一个改进的古诺(Cournot)竞争模型对来说明中央政府和地方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博弈。

## 二、金融资源分权配置的博弈模型

设社会金融资源配置由中央和地方垄断。中央政府配置金融资源除可以获取税收和经营收益外,一个隐形的收益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掌握可以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政府介入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较快增长。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是金融资源控制量的选择。他们同时从策略可行集合 $Q_i = [0, \infty] (i=1,2)$ 中选择金融资源控制量 $q_i (i=1,2)$ ,单位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与金融资源控制的总和密切相关(这里的隐含假设是金融资源主要由民间资本来配置效率更高),设为 $e(q_1 + q_2)$ , $q_1$ 为中央政府选择的金融资源配置量, $q_2$ 为地方政府所选择的金融资源配置量。配置主体 $i$ 的配置成本(即控制成本)为 $c_i(q_i) (i=1,2)$ ,配置主体 $i$ 的总收益因此为:

$$u_i(q_1 + q_2) = q_i e(q_1 + q_2) - c_i(q_i)$$

可行集 $Q_i$ 和收益函数 $u_i$ 确定了博弈的策略形式。反应函数 $r_1: Q_2 \rightarrow Q_1$ 确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每种固定金融资源配置量下的最优配置量,反应函数 $r_2: Q_1 \rightarrow Q_2$ 确定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每种固定金融资源配置量下的最优配置量。

如果 $u_i(1,2)$ 是可微和严格凸的,而且满足合适的边界条件,我们可以用一阶条件来求解这些反应函数。例如, $r_2(\cdot)$ 满足

$$e(q_1 + r_2(q_1)) + e'(q_1 + r_2(q_1)) r_2(q_1) - c_2'(r_2(q_1)) = 0 \quad (1)$$

两个反应函数的交点(如果存在)是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在给定对手金融资源配置量的水平下,没有一个配置主体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量而获益。

作为实例,对于效率函数 $e(q_1 + q_2) = \max(0, a - q_1 - q_2)$ 和线性成本 $c_1(q_1) = c_1 q_1, c_2(q_2) = c_2 q_2$ ,其中 $0 \leq c_i \leq a$ ,中央政府由式(1)给出的反应函数为(在相关区域上)

$$r_1(q_2) = \frac{1}{2}(a - q_2 - c_1)$$

地方政府的反应函数为

$$r_2(q_1) = \frac{1}{2}(a - q_1 - c_2)$$

解两个反应函数,我们得纳什均衡为

$$q_1^* = r_1(q_2^*) \text{ 和 } q_2^* = r_2(q_1^*) \text{ 或 } q_1^* = \frac{a + c_2 - 2c_2}{3} \text{ 和 } q_2^* = \frac{a + c_1 - 2c_1}{3}$$

(下转第70页)

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这些作品中群体“自我扩张”的豪迈精神反映了人对自身认识的半蒙昧状态和脱离生活实际的讲大话特色。

其二,从忠于时代假象演变戒心造幻影。一些诗人面对违背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社会现象缺乏清醒认识,一味盲目自信,还据此而调动畅想象力,展开虚幻的构想,由此完成的作品不论主体吹入多少热气,也只能是背离生活真实的一场随心所欲。田间所作长达七部、近一万八千行的叙事长诗《赶车传》就是这一创作现象的集中反映;其小生产者意识的构思与粗制滥造的作风,给诗坛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小。

其三,无视社会实际,掩盖生活真相,把创作引向粉饰现实的境地。在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面对“三春饿殍”的现实,严阵竟然写出一本《江南曲》,一反自己以往创作中制造时代神话的狂热奋进的浪漫高歌,去唱社会宁静和谐、生活安适满足的田园牧歌,这现象如果不认为是逃避现实,那该是粉饰现实。

其四,1962年以后的诗坛火药味很足,气势凌厉,把浪漫化的阶级斗争抒情引向人为的激昂慷慨。如严阵的《竹矛》、张志民的《擂台》、陆荣的《重返杨柳村》。这一批向政治抒情诗群靠拢的诗人尚且如此,本是政治抒情诗群中人的郭小川写《战台风》、《青松歌》,贺敬之写《雷锋之歌》,出现虚幻性、浪漫化、矫揉造作味,那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上问题的出现,也都只能归结于诗歌(文艺)必须为政治现实服务这一极左文艺方针极端化的推行。至于这时的政治抒情诗群自身,则已和建国初期“放声歌唱”年代贺敬之、郭小川等的政治抒情诗所遵循的审美追求有了更多的不一致,可以说它在文学极端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已从一般的变化转为某种意义上的异化。

#### 参考文献:

- [1]艾青.公刘的诗[J].文艺报,1955—13.
- [2]胡风.关于《时间开始了》[Z].胡风诗全编[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76.
- [3]徐迟.诗和生活[M].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71.
- [4]盛笠生.要以不朽的诗篇来歌颂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回答》[J].人民文学,1954—04.
- [5]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J].人民文学,1955—04.
- [6]曹阳.不健康的感情[J].文艺报,1955—06.
- [7]严辰.沸腾的生活和诗[J].文艺报,1956—03.
- [8]郭小川.沸腾的生活和诗[J].文艺报,1956—03.
- [9]臧克家.沸腾的生活和诗[J].文艺报,1956—03.
- [10]余芥.错误的缩小和缺点的夸大[J].红岩,1957,(8):72—74.
- [11]洪钟.《星星》的诗及其偏向[J].红岩,1957,(3):41—45.

(下转第43页)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纳什均衡收益分别为

$$u_1(q_1^*, q_2^*) = \left(\frac{\alpha + c_2 - 2c_2}{3}\right)^2 \text{ 和 } u_2(q_1^*, q_2^*) = \left(\frac{\alpha + c_1 - 2c_2}{3}\right)^2$$

由于中央政府的控制成本要远大于地方政府的控制成本(归因于国有金融组织的低效所累积的风险),所以中央政府  $q_1^*$  的均衡配置量要小于地方政府  $q_2^*$  的均衡配置量,同时中央政府的均衡收益  $u_1$  也小于地方政府的均衡收益  $u_2$ 。

在这一博弈中,虽然中央政府的均衡收益  $u_1$  小于地方政府的均衡收益  $u_2$ ,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源的博弈中各方已取得了最大化收益,达到了纳什均衡,所以如果金融资源配置的成本与收益状况不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央政府是不会率先退出,把金融资源的配置权让与民间。而给定中央政府不退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纳什均衡。

这一博弈给我们的启示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因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资源已成为博弈的均衡解,中央政府缺乏推动国有金融组织改革的动力)下,通过扶植(或至少不压制)非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当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日益重要时,游戏规则将被迫改变,国有银行将面对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它们或者退出资源配置市场,或者改变经营行为,这样地方政府也就无法通过国有金融组织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从而金融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将获得提高。

#### 参考文献:

- [1]张杰.地方政府的介入与金融体制变异[J].经济研究,1996,(3):21—26,42.
- [2]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J].经济研究,1997,(7):20—25,78.
- [3]林波.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国家模型与效用函数[J].金融研究,2000,(12):45—55.
- [4]易刚.中国的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1984—199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5]朱·弗登伯格,让·梯若尔.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